

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本报评论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作为明年首要任务，充分说明新常态下稳增长力度松不得。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好这一精神，才能更好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从今年前三季度的情况看，我国经济运行稳字当头，态势良好。展望明年，稳增长任务依然相当繁重和艰巨。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总体复苏疲弱态势难有明显改观，国内经济运行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旧矛盾与新问题交织，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部分经济风险显现。应对这些“成长中的烦恼”，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不行，经济增长失速也不行。没有稳定的经济增长，就难以解决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就难以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增长“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意味着新常态下确保“稳增长”，需要花更大气力、有更大作为，形成与以往不同的增长结构和动力机制。我们不能把稳增长和调结构对立起来

伴随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增长正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结构调整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存量与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新常态下“稳增长”的潜力十分巨大，机遇也非常难得。当前，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深入发展，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国民储蓄率较高，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保持稳定，这些都为我国经济实现稳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开辟了广阔空间。

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巩固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要克服传统增长模式下以速度为纲的惯性思维，也要走出“速度调低了，就可以少作为、不作为”的认识误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增长“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意味着新常态下确保“稳增长”，需要花更大气力、有更大作为，形成与以往不同的增长结构和动力机制。我们不能把稳增长和调结构对立起来，对过剩产能的调整固会影响增速，而激发新增长点的潜力，做好新兴产业的加法和乘法则会创造更多增长正能量，



期待高铁车次更好满足需求

中国铁路总公司近日介绍，为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自2015年1月1日起至3月15日止，铁路部门将在京广、京深、沪广、沪深间增开8对高铁动卧夕发朝至列车。

【微评】近年来，随着我国高铁建设的快速推进，高铁客流量在大幅增长，全国铁路动车组列车的旅客发送量已占总发送量的40%左右，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商务、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不过，春运等高峰时期，一些车票仍是一票难求。顺应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现推出高铁动卧，并以夕发朝至的方式来行车，无疑为一些旅客提供了出行便利，同时夜间高速行驶也表明我国高铁列车性能和工作人员服务达到新水平。不过，目前有些高铁的票价特别是卧铺票价还是比较高，大多数乘客很难承受得起。期待铁路部门还能更充分挖掘运力资源，更科学地调配车次，以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要。

不合理的收费就该取消

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档案局等五部门日前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将于2015年1月1日起取消流动人员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等内容。

【微评】薄薄几张纸，每年百十元，流动人员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方面存在的不少问题，早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吐槽。人事档案是国家法定的实行强制性归口管理的文件资料，具有明显的公共信息的特征，公共服务业务应由政府买单。之前让流动人员自己支付档案管理费用，既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也难免让人质疑数额巨大的费用都被用在哪些方面。相关部门提前取消收取相关费用，是对民意的体认和政府职责的回归，是不小的进步。其他一些不合理、不必要的收费，该取消的也应早点取消。

“扬善营销”，这个可以有

日前，浙江某地的一家豆捞店正式开门迎客。首批接待的不是普通消费者，而是附近社区内的20位独居老人。店主说，敬老是传统美德，老人的子女平时都不在身边，趁着新店开张机会，请长辈们尝尝鲜。

【微评】从既往经验来看，大多店家的开业酬宾都会紧盯自己的目标消费群体，以便获得客源。报道中的这家豆捞店却请一些留守老人来免费尝新，这种诚意敬老、以情暖人的“酬宾”方式，既弘扬了社会主义道德，也起到了店铺宣传的作用，可谓一举两得。即便这种方式会被认为是“扬善营销”，但其传播效果却往往要好于直露的“硬广告”，对传播友善、关爱的理念具有重要作用。

来论 Letters

用负面考核

抽掉“为官不为”懒筋

阳明

据报道，在湖南省新宁县的最近一次干部调整中，有20名县委管理的干部因“负面考核”不合格而暂缓提拔。

作为一种表彰先进、鞭策后进的重要手段，考核对调动各级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催生发展动力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些地方在考核评比的时候，倾向于表彰“先进”，而忽略了“后进”。这种只注重“正面考核”和横向比较的机制，让部分官员“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似乎还找到了“为官不为”的托词：基础条件好的地方，无论谁坐在这个位子上都能拿到好名次；基础条件差、资源禀赋不好的地方，无论领导干部干得多么认真，较原来的成绩有明显进步，也难以得到关注和肯定。同时，这也让一些热衷于得奖牌、争冠军的官员围绕GDP打转，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如今，不少地方打破固化思维，探索建立“负面考核”等更加科学合理的机制。其目的就是校正“唯GDP论英雄”的理念，遏制“一俊遮百丑”的“政绩冲动症”，倒逼各级主政者树立底线意识，时刻注意守住工作“底线”，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打基础、利长远、办实事、惠民生上，创造出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检验的政绩。

在设置“负面考核”等考核指标体系时，要坚持把科学发展作为目标责任考核的“指挥棒”，在考核权重划分上，既突出经济发展指标，更强调社会发展指标；既强调发展的速度，更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既突出对“实绩”的考核，更强调对“潜绩”的考核。通过实行分区域差异化考核，打破“龟兔赛跑”、“鸡鸭游泳”的规则，让相同级别的选手同台竞技，只要因地制宜补齐短板就能争奖牌、得冠军。如此，才能体现出公平性，使得比赛更具规则性。无论是过去的“常胜军”也好，还是安于现状者也罢，都安装上了“驱动程序”，激活干事创业的动力，促使他们对标定位，找准主攻方向，释放潜能。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本版编辑 张伟 马洪超

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

戴卫民

陕西省日前表示，将由财政支持建设10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四川省成都市提出，到2020年全市高技能人才比例从目前的19.6%提升到36%；广东省惠州市实施了“首席技师”培养工程，计划5年内引进培养6万名以上高技能人才……近年来，高技能人才越来越受到各地重视。许多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也完善实践教学体系，与企业人才培养、协同创新等方面开展合作，培养了大量的高技能、高素质人才。

劳动者技能水平的高低，决定着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程度；劳动力结构是否合理，影响着国民经济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作为专业技术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技能人才对于助推经济快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高技能人才的总量、结构和素质有了很大改观，他们已经成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链的重要一环，在节约资源能源、降低生产成本、改进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从而使企业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

然而，也有一些地方和单位似乎更看重高学历人才的培养，而忽视了高技能人才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分配机制仍不合理，对高技能人才激励政策落实不到位；另一方面，“重科学、轻技术”、“重知识、轻能力”的观念根深蒂固，使得高技能人才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部分单位简单按学历、文凭的高低确定员工的工资标准和职位，这影响了高技能人才发挥技术才能的积极性，使部分“蓝领”不肯下功夫钻研技术。也间接

使许多青年人盲目追求高学历，不想接受职业教育，不愿到生产第一线当技术工人。此外，部分企业急功近利，舍不得投入时间、精力和费用，高技能人才培养受限，导致了一些领域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

高技能人才短缺的状况，已成为制约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瓶颈”。应该看到，我们不仅需要培养一批高层次知识和技术方面的创新人才，而且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技能型高素质劳动者。培养高技能人才正逢其时，但这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一是加大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宣传力度。通过政策支持和舆论宣传，营造崇尚技能、尊重技能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和环境，激发广大劳动者立足本职、钻研技术、苦练技能的积极性。二是政策上激励。要定期或不定期表彰高技能人才，给予高技能人才一定的精神、物质奖励，并且适当提高高技能人才的待遇，从而激励更多的一线职工加入到高技能人才队伍中来。三是举办形式多样的技能比赛，对比赛优胜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并颁发相应的荣誉称号。让青年职工通过参赛，加上平时的钻研，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逐步成长为高技能人才。四是企业要有长远的发展眼光，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和举办讲座等多种形式，结合企业实际，开展适合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特点的各种培训，想方设法提高职工的业务技术素质，使越来越多的职工在平凡的岗位做出不平凡的业绩，让企业充满活力。



徐骏作(新华社发)

中国游客大闹亚航致使返航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对此，国家旅游局近日称已对涉事乘客进行处罚。近年来，类似航空“闹剧”不时发生。目前，我国年出境游已突破1亿人次，“文明旅游”为国家大力倡导并已升至法律层面，但国内一些人在离境出游时一再被打上不文明烙印，这不禁让大多数国人感到忧虑。建议对这部分航空“闹剧”制造者不仅要处以罚款，还要通过“黑名单”制度使其在乘坐飞机高铁、办理银行贷款等多方面受到限制，让其对自己的行为真正“上心”，从而改善国人的出游形象。

(时锋)

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上限应改进

张汉斌

监管部门决定资产证券化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之后，相关市场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引起不少投资者的关注。近日，首批“改制”后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正式发售。

资产证券化是创新型直接融资模式，其通过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实现资产信用来代替主体信用进行融资，对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大有帮助。但是，目前无论是信贷资产证券化还是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缺乏应有活力，交投都有些清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管市场”思维下合格投资者200人上限不妥。

200人标准的由来与公募、私募界密切相关。根据现行《证券法》，证券发行对象累计超过200人即为公开发行。在此框架下，按照“非公即私”的思维惯性，2012年底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第88条规定，非公募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200人。我国监管层将资产证券化产品先验性划定为私募，也就有了发行和转让200人的上限。

200人上限是否合理，需要商榷。首

先，200人上限并无多少理论依据。也就是说，现行任何国内外法律法规都没有合理解释为什么是200人？事实上，200人也没有多少经验支持。美国对私募合格投资者人数并无限制，满足特定条件的发行企业可以向任意数量的合格投资者进行不受金额限制的私募发行。也就是说，私募尽管信息披露要求低，风险较大，但限定风险完全可以通过合格投资者标准来做。我国对私募既加以合格投资者标准限制，又加以人数限制，虽然监管显得方便了，但实际上是容易造成先入者垄断局面的重复限制。如果现有投资者既不想退出，又无力或不想增加投资，容易出现交易停滞；既得者垄断交易权，潜在投资者难以进入，市场交投不能达到应有的活跃度和吸引力，产品流动性差，融资成本高昂。

即使法律框架短期难以修改或突破，但借鉴发达市场经验，资产证券化产品涵盖范畴宽，完全可以分层适用不同募集方式。比如，高评级的应收账款类或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由于破产隔离、信用增级等措施，其安全性比普通

债券更高，完全适合公募（或者像发达市场出现的有融资规模限制的“次公募”），公募也会有效促进市场化定价机制实现；部分风险较高产品，如重整资产证券化产品，或由于法律缺陷无法实现破产隔离的收益权证券化产品，以及仅通过资金监管账户实现现金流隔离的资产支持票据等，可限于私募。

要限定资产证券化发行的风险，完全可以通过投资者适当性标准或附加融资规模来进行，而不必是不具公平性的投资者数量限制。放松甚至取消合格投资者上限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增强市场流动性和活力，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实际上，突破投资者上限的做法已经在实践，如各种投资者“伞形结构”计划就可以扩充投资者队伍，虽然这实际上增加了交易成本。刚出台的相关业务管理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投资计划，也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这说明资产证券化投资者上限实在需要松动，也符合中央倡导的依靠简政放权和创新来发展经济的精神实质。

观察 On Watch